

我对历史的看法

黎东方史学丛议

Wu Jue Li Shi De Kan Fa

L. Dongfang

Shi Xue Cong Yi

学苑出版社



HAIWAIXUEZHEWENCONG

我对历史的看法

黎东方史学丛议

学林出版社



外学者丛书

关鸿 魏平主编

我对历史的看法

——黎东方史学丛议

作者:黎东方

特约编辑:胡宗英

责任编辑:张建一

装帧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5 万

印数:5000 册

定价:13.50 元

ISBN 7—80616—335—2/I·160

出版缘起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特别是时光进入 20 世纪,在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大背景下,更是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才思横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而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使之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学者中的有些人长期侨居和治学于海外,造成大陆读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生涯及本人的学养、处世了解甚少。为此,我社决定推出“海外学者文丛”。诚然,我们并不赞同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某些态度及本丛书中的部分学术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的认同。唯其如此,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状况和学者风貌的一种补充,本丛书自有独特的出版价值。鉴于大

陆在当今语法体系等方面与海外的习惯有些不同,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少量删节,特此说明。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

卷首语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190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其父黎塗字衡平,清末举人,仕于江南。

他先受母教,诵读经史。后入小学,九岁从师习英文。稍长,负笈远游,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专攻史学,为梁启超最后及门弟子。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学习史学和哲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1931年以所著《比列志士记》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随后即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有夏鼐等人,卓然有成。

“九一八”事起,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后又应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请,至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战期

间,除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他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能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发前人所未发,听众闻所未闻,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胜利后,他应赛珍珠之邀赴美,助编《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此举为全美大学最早者。

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在美国和台湾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几十年如一日,蜚声士林,欧美争聘。

他在著述之暇,尝多次用英语在各大城市作公开演讲,弘扬中国文化,不亚抗战时之谈笑风生。他身在海外,情系宗邦,念念不忘归根,以八十五高龄撰写《我们的根》,使在欧美出生的华人后代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认识我中华民族如何缔造了大好河山和优美文化,其一片真挚的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他已出版专著四十余部,其中《世界联邦论》等法文著作,《东方分析》、《第二次中日战争》等英文著作和《中国历史通论》、《西洋通史序论》等中文著作。本丛书所选《我对历史的看法》是东方先生最有影响的著述之一。东方先生还特意为此书的大陆版作了增补修订,撰写序言,我们深表谢意。

弁 言

弁 言

由于萧关鸿先生的鼓励及学林出版社同仁的热心,我这本《我对历史的看法》获得以简体字版见正于大陆史学界之机会。原版的几篇文字,也藉此机会酌量改换,去掉无关宏旨的,改用与整个中国历史有血脉相连的几篇。谢谢天风社的林太乙女士,台北商务印书馆的张连生先生,华欣出版社的程国强先生,黄埔出版社的章文仪先生,正中书局与远东书局的浦家麟先生,文化大学出版部的李福臻女士,远流出版社的王崇文先生,与传记文学社的刘绍唐先生,我永久记得他们在过去与现在对我种种协助。我尤其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崔美明女士把我介绍给萧先生。

目 录

目 录

卷首语	1
弁 言	1
我对历史的看法	1
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分析	14
孔子传略	26
战国秦的发展	95
楚汉战史	99
三国战史	136
淝水之战	169
一个拚命的留学生玄奘	174
王安石	187
耶律楚材	199
张居正	210
吴三桂觉悟经过	225
八国联军与辛丑和约	234
武昌起义的完整史实	257

我对历史的看法

因为我是一个学习历史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仰者，便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篇关于民生史观的文章。在这里，我应该提起逝世已久之纪云樵同志，当我还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从革命高潮笼罩着的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勉励我在这一方面努力。现今时隔近二十年，而我的学业依然无甚成就，这是我引为十分惭愧的。

一直到了今天，我依然不敢以民生史观的标题来写一本书，或是一篇文章。这由于我关于历史的书籍读得太少，关于历史的内容又观察得太不充分，并且总理孙中山先生所留给我们的论及民生史观的遗言，又如此的简括，令一个仅获见总理一面而未能亲承教诲的后生如我，不敢于许多不明了的地方妄加揣测。因此在今天，我只敢写一些我个人对于历史的看法，

不敢说这就是民生史观。

严格地说,以我的学力而论,我配不配已经有一个看法,根本也成问题,只是权且写来,作为一种读书报告罢了。

所谓历史,普通只是单指人类历史而言。若就广义的字义来说,则凡是宇宙间一切曾经有过的现象,都可以称做历史。

这便是历史一词的真义。它是过去了的,它是杳然不可捉摸的。史料仅是它的残骸。我们凭藉一点点史料,来写历史,或讲历史;无非是按照我们从“现在”所得的个人经验去想象“过去”的情形而已。

况且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接触得到、体验得到的“现在”,也极其有限。我们连记录一部现代史的资格都没有,焉能写出人类全部的去,或甚至把握整个宇宙的去,以探寻其中进化的轨迹?

诚然如此,困难尽管困难,人们追求理解的欲望却随着每一时代哲学与科学的进步程度,而时时表露出来。远在西洋有正反合的历史解释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治一乱的见解。在西汉我们又有过五行相生相克的历史观。

到了20世纪业已过了一半的今天,各方面的进步已经不容许我们再从一个先定的原则出发,以演绎的方式去推论各时代的历史发展。我们似乎只有采用归纳的方法,先集中一切可能有的材料,加以分类与标明,求得其中的同异;从同的里面找出一些原则,再把所异的地方加在那些原则里面,作为制限。

如此的方法虽未必即能给予研究者以正面的结果，却能在消极方面先打破若干错误的成见。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姑不必论，一治一乱的说法就立刻显露了它的破绽。我觉得治之日短，而乱之日长。人们惯言商代有五治五乱，我觉得在商代三十一位天子之中，若仅有成汤、太甲、太戊、盘庚、武丁五朝是治世，则其余二十六朝便是乱世。商代应该称之为五治二十六乱。汉唐两代，比较地可以称为盛世，而按其实际，前者仅有文景之治，后者仅有贞观之治，为时均不甚长。西洋的历史亦复如此。所谓罗马帝国，也仅有安东尼一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而已。至于一分一合的说法，也是分的时候未必相等于合的时候。倘若所说的合，是指的中国之“本部”，则夏商西周为合，春秋战国为分，秦汉为合，魏晋南北朝为分，隋唐为合，五代两宋为分；元明清又合。究其实际，则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我们即便承认此一治一乱与一合一分的公式，包含有一张一弛的真理，也得不到什么实际的教训。因为倘若我们是处在某一“合”的时期，我们并不能预言究竟要再经若干时日，又入“分”的阶段。

这一治一乱与一合一分，可以称为历史的两分法。正反合的说法，便可以称为历史的三分法。就内容来看，三分法似乎要充实得多。三分法说一切的制度与文化，都要由正变为反，由这个东西变成不是这个东西，末了又变成兼有这个东西的原来成分与反于这个东西的新的成分。这比起一治一乱、一合一分、循环主义的旧看法，当然是进了一步。然而人类历史

之中，也确包含一些循环重演的现象，又包含一些昙花一现，正而不反，或反而不合的东西。进化本身，实在没有正反合三字所暗示的那么整齐。

在我们中国，还有另一种四分历史的办法，便是穷变通久四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我感觉到它的内容，比起正反合来，又要充实一些。它而且不是循环主义的：第二个穷字是变了以后的穷，是另一制度的穷，并非原来制度的穷。这似乎是很合理的进化过程。问题在于：穷的时候未必能变。是谁来变？是制度本身会变？还是有人来将它变？既是要靠人来变它，人也许有时不懂得，或不愿意来变它呢！

五德终始或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五分法。可惜它以金木水火土来与历代的祥瑞相配合，未免太牵强。金的确能克木，金也的确可以称作“为土所生”，但这似乎是一种“数学”，而不容易引用到历史上面来。

狭义的历史既是专指人类的历史而言，则人的成分自然不容忽视。倘若历史的本身会变，而人类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则此种变的背后，若不是上帝，定为一种支配宇宙间任何变动的“总原则”。截至现在为止，此“总原则”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退一步说，我们在没有发现它以前，姑且承认它有；它所支配的历史，是谁的历史呢？是宇宙的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包括其中。

· 可惜我们已知的宇宙历史，实在是太少了，还不

能从宇宙史与人类史的比较之中，求得若干共同的现象。我们仅能知道，由星云而产生太阳，分出地球，造成太阳系；在地球上，先有火，后有岩石，后有水，后有生物；在生物之中，先有水生之下等动植物，后有登陆之较高等动植物，先有无脊椎动物，后有有脊椎动物，最后又有人类。这样说来似乎全是顺利的发展，却完全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其实如此的发展，包括了不少次的挫折，又依赖了无数的不可预期的“巧合”，才偶然侥幸而有如此的结果。老实说，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能够存在，能够进化到一跃而为万物之灵，也的确是侥幸。

这侥幸或“巧合的作弄”也许便是宇宙间一切变化的总原则吧？那又未免太近于悲观了。真正的总原则，似乎便在那侥幸与不侥幸之间，靠巧合与不靠巧合之间。

我们所谈的历史，毕竟是只谈人类的历史。那支配一切的总原则如果存在，当我们专谈人类历史的时候，也应该先支配了人类，再表现到人类的历史上面来。撇开了人类本身，人的本性，来解释人类史的变化历程，等于撇开了李鸿章，来写一本李鸿章的传记。这实在是荒唐得很。

有些人，专就地理的因素来解释历史，有所谓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的环境，足以决定历史上的变化。若说地理环境关系很大，这原是很合理的：例如草原地带，容易产生游牧大帝国。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凡是草原地带一定产生游牧大帝国。一定要添入某一

帝王的野心与能力,以及多数能征惯战的拥护者,与足供侵略征服的若干比较无能的四邻,这才可以出现一个大的游牧帝国。

较之地理史观略高一筹的便是经济史观。经济,是人类的经济:这似乎以人类自己的情形,来解释人类的历史了。可惜经济史观的理论家常常偏到制度方面:认为制度的变化足以决定人类的变化,不曾晓得制度本身原是由人所造。

倘若我们真愿意先研究人类本身,再研究人类的历史,而研究的时候又能忠实于归纳法,则我们便可以得到类似于下面所列的结论。

人类在求生存的一点上,实在与其他的生物没有什么不同。人类为什么要求生存,何以知道求生存?那么,动物何以都要知道觅食,要求偶;植物何以要知道要吸收日光水分,要开花结果?中国的圣人说,“食、色,性也”;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伦也”。这真是基于宇宙论的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上,初则以小群各自为战与异类的动物相斗;等到生齿日繁而自然界的供给有限,便免不了互相争夺,发生同类相残的现象。这在动物之中,如蜜蜂,如蚂蚁,也未尝没有。

所不同的,似乎是人类特有一种人性。这人性细细分析起来,也并非上帝所赋予,而是长期的对毒蛇猛兽、敌族敌国的战斗,所养成的一种同仇心与互助习惯的发展。

随着人生的发展,我们看到人类求生存的方法,

是一天一天地进步。初则各人仅顾一人一氏族之不被杀害,不遭饥饿,与不致绝灭,其后逐渐扩大范围,图谋一部落,一国家的共同生存。于是政治的组织,跟着血统的组织而成为必要:种种工具与武器的发明,也逐渐地加速加多。等到有了文字,一切的经验都得到堪以累积的基础。而人之所以为人,便迥非蜜蜂、蚂蚁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此后的人类,便是有“史”以后的人类,较之有史以前的人类,在生活的内容上骤然丰富起来。从暗中摸索的“动物群”的生活,一跃而进于有理性的生活。单就时间来说,自从文字发明以来,离开现在,还短得很,差不多仅是昨天的事,至多可说是一万年而已。(中国之已知的文字史料,始于商朝,仅有四千年左右;埃及的历史始于公元前4241年,亦仅有六千年左右;假定图形文字的发明又早于此,也不过一万年左右。)倘若人类果然是诞生于二百万年以前,则我们写一部二百页的人类史,便仅有最后一页的下半页,可以填入几行文字,足见人类史可写部分之短。

在如此短促的半页文字之中,要看出如何正确的道理来,原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有很多民族,一盛而永衰,一兴而永灭,留下来的痕迹很少。单就现尚存在的若干民族而论,由于语言文字的极度纷歧,我们也很难完全了解每一民族的历史,以求得彼此间的异同,与整个人类的进化经过。

姑就中国与欧洲这两大区域的局部进化,来加以分析,人类的历史在有了文字以后,正如未有文字

以前一样，都是求生存的历史：所不同的，是组织的能力加强，分工的趋势加甚，而人性的陶冶也进步不少。

表现于中国的，在史前三皇时之氏族并立，五帝时之部族结盟，在史后有夏代之始有朝代，商代之始有畿领，西周之始行分封，中经春秋战国之纷扰，而结束为秦汉以来之大一统。大一统的局面，屡经磨炼，而终能存在、以确保中华民族的安全生存。

表现于欧洲的，在史前有克罗马尼翁等种族，在史后有希腊人及高卢人之城邦联盟及部落联盟，有罗马人之城邦帝国，日耳曼人之封建帝国，中经黑暗时期诸侯爵主之割据，而结束为偌大独立王国，演进为今日之若干由混合民族所组成的所谓民族国家，以分别保障若干千万居民的生存。

这是政治。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制度方面的变迁：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内部的各项政权的分立或集中，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人才的登庸方式与黜陟方式、军队的招募、编配、训练、风纪等等。

再就经济的方面来说。人类能获得食衣住行四大需要的集体满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能力的个人，要解决自己一人的问题，并不甚难：他可以采取渔猎的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或牧畜的方式，或耕种、贸易、制造，任一方式。他要解决一家的问题，就颇为不易。再进一步，一个民族的领导者或若干领导分子，要满足全民族的四大需要，就着实艰巨得很。原因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政治及文化。